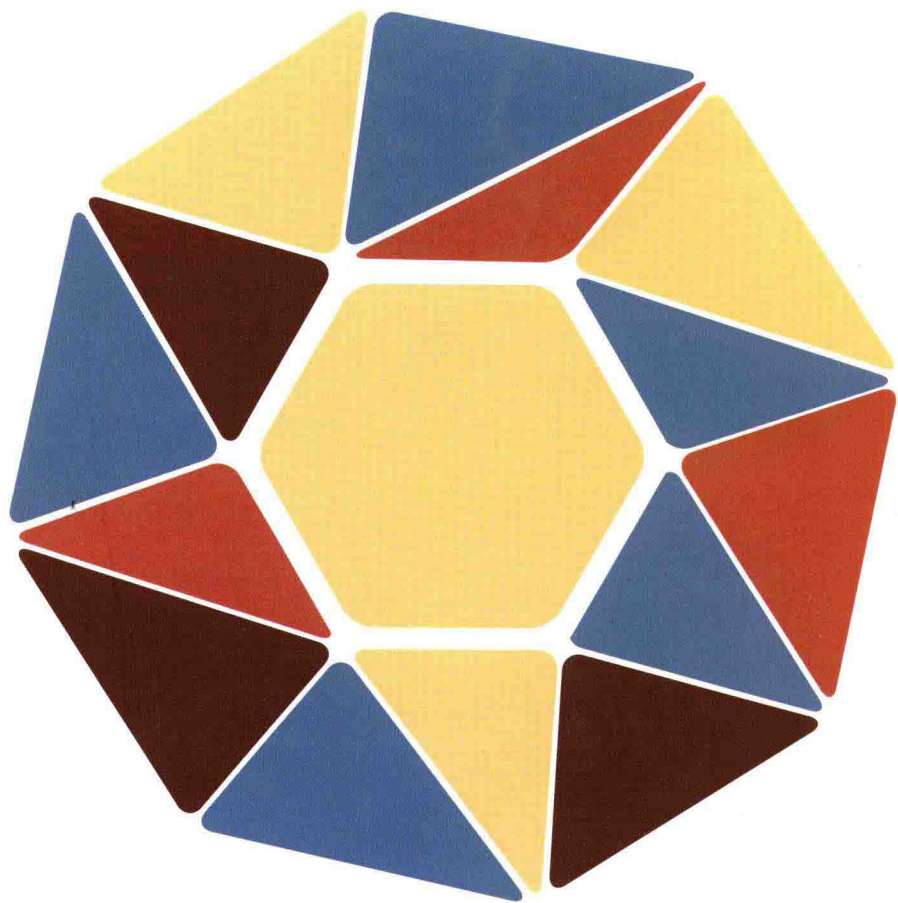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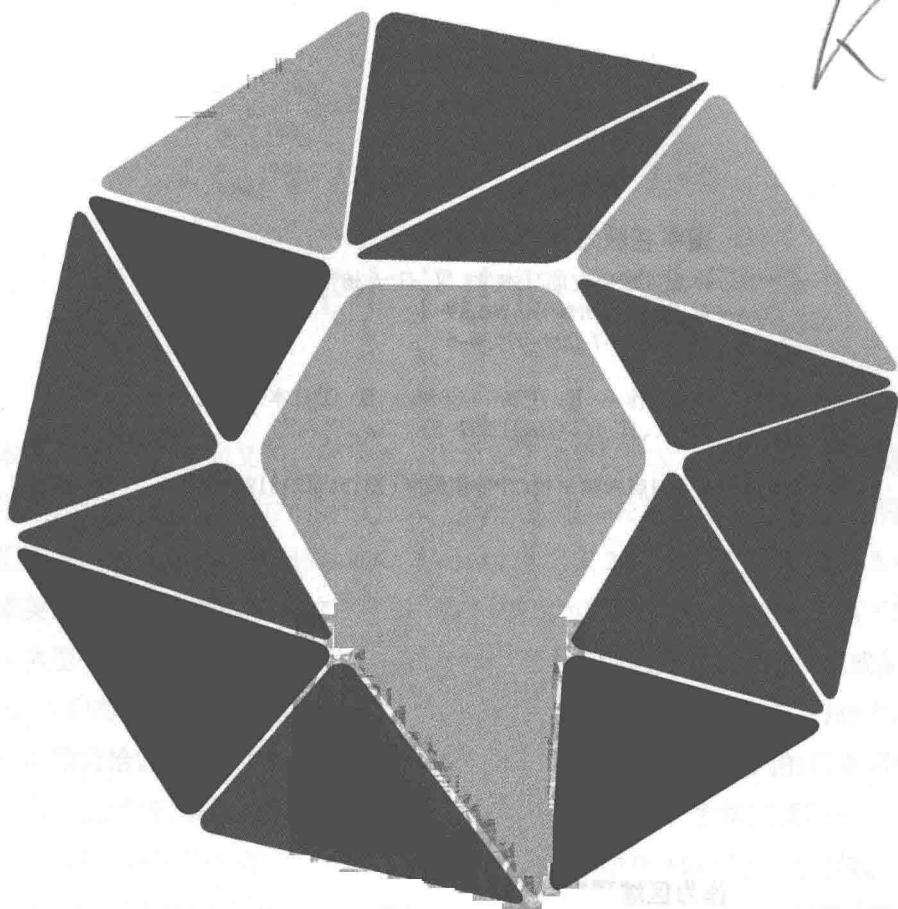


四川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所丛书 ④

作为区域研究的 日本学(上)

主 编 / 杨 伟 罗国忠
副主编 / 王宗瑜 赵戈非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K313.1
14

本书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和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赞助出版

四川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所丛书 ④

作为区域研究的 日本学(上)

主 编 / 杨 伟 罗国忠

副主编 / 王宗瑜 赵戈非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 汉、日 / 杨伟, 罗国忠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229-07036-6

I. ①作… II. ①杨… ②罗… III. ①日本—研究—
文集—汉、日 IV. ①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8186号

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上、下册)

ZUOWEI QUYU YANJIU DE RIBENXUE

主 编 杨 伟 罗国忠
副主编 王宗瑜 赵戈非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雷 刚

封面设计: 崔 琦

装帧设计: 袁 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市天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http://www.21txbook.com>

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道19号财富中心财富三号B幢8楼 邮政编码: 401121

电话: (023)6365893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3 字数: 533千

版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9-07036-6

定价: 58.00元(上、下册)

本书所使用方正字体经北大方正公司授权许可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重庆市天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调换: 023-6365893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写在本书出版之际

日本,一个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他者。作为异文化的日本文化,其地域性和独特性一直是中国学界关注的热点。而近年来中日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持续扩大的经济往来更是迫使人们不得不加强对日本的研究。如今,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种把日本作为学习和研究欧美的窗口或捷径的手段论正逐渐宣告结束,而更多是把日本作为走出了现代化独特道路的典型个案加以研究,从而促成了大量日本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大批研究成果的诞生。与此同时,人们对国内日本研究现状的不满声音也越来越强烈,认为《菊与刀》对中国人日本观的绝对影响力恰好反证了中国人日本论的缺失或落后。首先,由于国内的日本研究大多划分为文学、历史、经济、法律、社会等各个学科来分别进行,尽管各个领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却缺乏整体研究的方法和视野,所以对日本的整体形象缺乏有效而完整的把握。其次,各传统学科因偏向于基础性研究,不太关注与现实的关联性,导致与现实的脱节现象,大有被边缘化之虞;而以现实政治和国际关系论为切入点来进行的日本研究,又由于只专注于国际问题和现实政策,缺乏传统学科中的文化研究视野,而成为一时性的应景研究或意识形态的替代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感到有必要在中国提倡“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区域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家外交政策决策的依据,并成为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强调国际关系论与传统学科的融合和互补,调动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如历史、语言、文学,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以形成跨学科研究局面的“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无疑代表了日本研究的新方向。所谓的“区域研究”,乃是以主要国家规模的区域为对象,一边关注各地区的共时性,一边在与其他地区的比较中来考察该区域的特色,从而对该区域的政治、经济、产业、法律制度、社会、文化、民俗等开展广泛研究的学术领域。同时,它又是通过学术研究来回答现实世界所面临的诸课题的综合性学科。换言之,我们所从事的日本研究应该是通过导入比较文化的视点,凭借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中日文化间的差异为出发点,涵盖了日本文化、社会、历史、政治、军事、文学、语言等众多领域的整体性研究。它既要回答现实世界所面临的各种热点问题,又必须要超越这种现实性。即是说,要强调区域研究的学术性,使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研究成为一种即使作为学术

领域也足以成立的日本研究,即日本学。

为此,四川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所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赞助下,与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合作,分别于2011年10月22—23日和2012年12月1—2日举行了题为“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一)——从跨学科的角度出发”和“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二)——以事例研究为中心”的两次国际研讨会。2011年的会议邀请了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毛里和子,法政大学教授王敏、菱田雅晴、小秋元段、高柳俊男等日本学者就区域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论进行讲演,2012年的会议则邀请了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铃木贞美,早稻田大学教授坪井善明、梅森直之,以及法政大学教授小秋元段、曾士才、金原瑞人等著名学者作为特约嘉宾进行讲演,而来自上海、北京、南京、厦门、成都、洛阳、天津、济南、青岛、杭州、贵阳等地的国内学者也踊跃参会,两次的与会者共计约150名。通过这两次国际学术会议,梳理了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的概念,从理论上探讨了构筑这一综合性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至关重要的方法论。中日学者们以各自的领域为基点,从跨学科或者区域比较的视点出发,并以各自领域的事例研究为中心,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既达成了学术交流的目的,也推动了中国跨区域性日本研究网络的有机形成。

为反映这两次研讨会的成果,四川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所从两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中遴选出部分佳作,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和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处的出版资助,在重庆出版集团的大力支持下,编辑了《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上)、(下)两册,结集出版。通过上册的23篇论文和下册的18篇论文,可以分别管窥到2011年和2012年两次国际会议成果的一斑。

在本书出版之际,作为主编,我要特别感谢重庆出版集团的编审江萍女士和编辑雷刚先生,以及上海出版界的陈勤女士。他们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心血,让我们由衷敬佩。

四川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所所长

杨伟

2013年9月7日

目 录

【上册】

- “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在中国
——兼论其意识形态机制 杨 伟/文(001)
- 『愚管抄』と『神皇正統記』
——中世日本における二つの天皇観—— 小秋元段/文(008)
- 地域における国際関係・民族間関係の過去・現在・未来
——長野県飯田・下伊那地域を舞台に 高柳俊男/文(016)
- 在中国,漱石为何被广泛解读?
——解读“漱石文化圈” 王 敏/文 朱 捷/译(024)
- 替罪羊的呐喊
——对大江健三郎《人羊》的另一种解读 胜又浩/文 李 玄/译(032)
- 论王敏的官泽贤治研究 雷 刚/文(037)
- 『蛇にピアス』試論
——〈悪女〉の成長をめぐる物語として読む 蒋 葳/文(046)
- 伝統への回帰
——李修文の『滴泪痣』と谷崎潤一郎の『春琴抄』—— 尹永顺/文(057)
- 永井荷风笔下的清末上海
——以《上海纪行》为中心 钱晓波/文(065)
- 从《维庸之妻》看太宰治的“义” 陈潇潇/文(072)
- 夏姫像の比較研究 段云兰/文(079)

林罗山的文章与《古文真宝后集》	陈可冉/文(088)
对于《日本灵异记》中卷第二十四缘之冥界故事的考察	潘 宁/文(097)
关于辛亥革命前后旅日留学生的戏剧活动的研究	丁 曼/文(106)
卢沟桥事变前日本财界人士对世界形势的认知 ——以村田省藏 1937 年的《年头所感》为中心	王宗瑜/文(113)
近代日本小学教科书与亚洲观的形成	谭建川/文(121)
江戸时代幕府的清朝认识 ——以《清朝探事》为中心	屈亚娟/文(129)
草庵茶室における利休の時間意識 ——待庵を例として	黄 婕/文(139)
出来事生起のありかたを表す副詞の分類	彭玉全/文(147)
音声教育における日本語アクセント指導法	崔春福/文(157)
概念メタファーと日本語の教授	徐 琦/文(165)
日本人の“夫婦呼び名”考	徐 曙/文(173)
小议当今日本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以日本“飞特族”问题及其对策为中心	田莎莎/文(179)

【下册】

区域研究中的三角测量法 ——以日本的越南研究为例	坪井善明/文 唐先容/译(186)
超越“占领中心史观” ——对于不平等的发现	梅森直之/文 王宗瑜/译(190)
从概念建构史的立场看日本帝国大学制度	铃木贞美/文 杨 爽/译(207)

昭和/历史语境中的草野心平与中国 ——以其中国体验和亚洲意识的变迁为中心	杨 伟/文(216)
遗留日本的中国人 ——构成札幌华人社会的人们	曾士才/文 杨 羽/译(227)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日本财界人物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距离 ——村田省藏的中国认识及其化为泡影的莫斯科之行	王宗瑜/文(239)
论近代中国“进化史观”形成的日本背景 ——观念、资源与契机	杨 羽/文(247)
清末民初浙江监狱改良与日本 ——以 1906 年官派“调查日本监狱员”为中心	孔 颖/文(257)
《徒然草寿命院抄》与《本草序例》注释	小秋元段/文 陈可冉/译(264)
《本朝一人一首》版本考订	陈可冉/文(274)
从横写到竖写 ——辞典、绘本与漫画	金原瑞人/文 胡小语/译(282)
《哥儿》的“不安” ——作为小人物形象的“我”	细谷博/文 冯 千/译(294)
佐藤春夫和郁达夫的神经衰弱	杨 爽/文(302)
女性嫌恶与宗教回归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1Q84》	张小玲/文(312)
再论日语教材的本土化与国际化	李光贞/文(321)
论日语拒绝邮件中的“配慮表达”	章羽红/文(329)
动态语境中日汉条件构式的教学反思	毛青兰/文(338)
象似性与日语习得	徐 琦/文(344)

“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在中国

——兼论其意识形态机制

四川外国语大学 杨 伟

[摘要] 本文在梳理“区域研究”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总结了“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在中国的现状,并对其中的意识形态机制进行了认识论上的分析,认为区域研究的跨学科性所带来的超越性视角和对知识结构的反思性批判思维乃是日本学作为“区域研究”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区域研究 意识形态 知识结构 超越性视角 反思性批判思维

“地域研究(ちいきけんきゅう)”是一个日语词汇,乃是英语“area studies”一词的日译。作为“area studies”的中译,则一般使用的是“区域研究”或“国别研究”这两种说法。大致说来,前者是指对某一个地区的研究,而后者则适用于对某一个国家的研究(但在本文中,为了与日语的“地域研究”一词相照应,在针对日本这一国别的研究时,笔者还是使用了“区域研究”这一说法)。从广义上说,所谓的“area studies”原本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但在193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论研究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局限在地理学上的区域研究,开始谋求一种基于国际性视野的关于某地区或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的具体而专门的情报研究。这种与国际关系论处于互补关系的区域研究,从上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冷战为背景,在美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以密西根大学的日本研究所为代表,在很多大学都设立了类似的区域研究机构。从那以后到今天,以多学科研究为基础的区域研究在各发达国家里非常盛行,旨在认识某个区域或国家的“特殊性”侧面,构筑起以此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论和国际关系论。因此,“区域研究”可以说是主要以国家规模的区域为对象,一边关注各地区的共时性,一边在与其他地区的比较中来考察该区域的特色,从而对该区域的政治、经济、产业、法律制度、社会、文化、民俗等开展广泛研究的学术领域。

毋庸置疑,在中国进行的日本研究就是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国别研究。据南开大学2009年针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学会、主要研究机构和日本研究学者进行调查的结果,全国共有385所大学开设了日语系或日语专业,研究机构数为100家,专门的研究人员为1040人左右。^[1]这些数据足以证明,中国日本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数量已经居于世界各国日本研究的前列。中国日本研究的持续发展无疑得益于中国日语教育机构和日语学习者的迅猛增长,以及伴随着日语基础教育的发展所带来的日本研究者人数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此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对日本研究的重要性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中日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持续扩大的经济往来迫使人们不得不加强对日本的研究。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种把日本作为学习和研究欧美的窗口或捷径的手段论已经宣告结束,而更多是把日本作为走出了现代化独特道路的典型个案加以研究,在

同欧美模式的横向比较中来关注日本模式的独特性,从而促成了大量日本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大批研究成果的诞生。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丛书》、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中日文化研究文库》、北京大学王晓秋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大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研究丛书》和《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等都是近年来日本研究的优秀成果,被认为“其总量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任何时期,这成为中国日本研究大步前进的标志”。^[2]

与此同时,人们对日本研究现状表示不满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比如鲁东理在《中国的日本研究水平亟须进一步提高》一文中指出:“尽管日本这个国家十分重要,并且不断地和中国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国人也看似对日本谈得头头是道,甚至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义愤填膺,但是让人们说出中国人创作的关于日本的文艺作品和著作却很难有统一意见,甚至于没有佳作可以作为谈资。……中国的日本研究始终落后于日本的中国研究,也落后于美国的日本研究。《菊与刀》问世60多年来,其在中国的销量和影响远远超过中国任何一部日本研究著作,说明中国人无力取代,认知落后,而当年的日本不是现在的日本,《菊与刀》不可能解读和解决许多新问题。世界各国琳琅满目的日本研究书籍中,中国人的作品却影响不大。”^[3]

此文代表了学界一种较为普遍性的危机感和焦灼感,即国内的日本研究缺乏世界公认的研究成果。尽管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但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举出下列几个原因:一、由于国内的日本研究大多分为文学、历史、经济、法律、社会等各个学科来分别进行,尽管各个领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缺乏整体研究的方法和视野,所以对日本的整体形象缺乏有效而完整的把握。换言之,在日本研究的各个学科间缺乏有效的整合和跨学科研究,从而妨碍了对日本的全面研究;二、由于各个传统学科偏向于基础性研究,不太关注与现实的关联性,导致与现实的脱节现象,从而遭到边缘化,无法参与到日本整体现象的构筑中;三、那些以现实政治和国际关系论为切入点来进行的日本研究,又由于只专注于国际问题和现实政策,缺乏传统学科中的文化研究视野,而成为一时性的应景研究或意识形态的替代品。

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在中国提倡“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我们知道,所谓的区域研究乃是通过学术研究来回答现实世界所面临的诸课题的综合性学科。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尽管承认因以现实世界为对象而带来的各种制约,但同时又致力于超越这种制约的研究。换言之,我们所从事的日本研究既要回答现实世界所面临的各种热点问题,但同时又必须超越这种现实性,即是说要强调区域研究的学术性,使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研究成为一种即使作为学术领域也足已成立的日本研究,即日本学。学者徒温曾著文指出:“国别学有别于国别研究。地区学(如果有的话)也不同于地区研究。区别在于二者研究的重点不同。国别学和地区学,侧重于对国别和地区的文史哲方面(如语言、古代史、文学艺术、哲学、习俗等)进行系统的经典式研究。国别学和地区学为独立学科,不属于政治学或国际问题研究的范畴。”^[4]显然,徒温先生是把区域研究和地区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来划分的,这也代表了当今中国不少人对区域研究的固定观念。按照这种观念,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研究与日本学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强调的是现实性,属于国际政治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传统学科的基础研究。而笔者认为,正是这两者过分清晰的划界导致了如今国别研究中的局限性。而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我们必须强调自己本身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独立、自律,强调国际关系论与传统学科的融合和互补,调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如历史、语言、文学,以及政治、经济、

法律等学科,从而形成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局面。而“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提倡的就是将日本研究作为一门关注现实性并超越现实性的、具有学术自律性和自主性的崭新学科。

当我们强调区域研究与传统学科的互补和融合时,也是考虑到传统学科的分散性存在着无法完全应对当下研究环境的某些方面,因而尝试着从内部对传统学科进行改良和改造。我们知道,区域研究具有区域上的跨越性和学科领域上的跨越性。因为它是对某一区域的整体性研究,毋庸置疑地囊括了研究对象的整个区域。而就学科领域上的跨越性而言,不妨把它看做是关于某个特定区域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当我们从广义上来把握“日本研究”这一概念时,可以把它视为各个传统学科的一种松散的集合体,而当我们在狭义上把“日本研究”视为区域研究这一独立的学科时,照样可以把相邻的传统学科看做是区域研究这一学科得以成立的下位领域。处于这一下位领域的研究者们依据其研究的对象和视点,乃是被他所从事的传统学科的研究方法所规定的。他们有可能是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政治学者、语言学者、文学研究者、哲学研究者等等。不用说,他们的研究成果中肯定有不少采用了作为区域研究之特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但却并不意味着每个研究都一定是跨学科的,而毋宁说大多沿用着相邻的传统学科的研究框架。换言之,至少在各个具体的研究中,跨学科性并不是区域研究得以成立的必须条件。这时的跨学科性并不一定要体现在每一个研究的内部,而毋宁说它体现为一种基本的立场或意识,即这些个别研究构成了日本整体研究的一角。这种立场和意识不仅对于从事区域研究的研究者来说,甚至对从事日本研究的各个学科的研究者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这种立场和意识必然会给各个学科研究者带来更加宏大的视野,促使他们认识到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性,一边接受来自其他学科的刺激和启迪,一边积极地进行自我改良,并与其他学科之间建立互补关系。

区域研究依靠跨越复数的学科,拥有一种从外部来观察自己学科的基本态势。尽管各个传统学科也潜藏着对自身进行反省的视线,但在通常的研究中却常常受制于学科自身的内在视线。而与此相对,区域研究所具有的跨学科性使其视点频繁地移动到学科领域之外,从而有可能清晰地从外面观察到传统学科内部固有观念的不合理性和局限性。

我们知道,区域研究的发祥地是美国。美国在冷战后为实现对世界的霸权,急需获得推进其世界战略的各种情报。为此,美国不惜投入巨资培养亚洲和非洲问题专家。由于欧美式的常识在这些地区难以通行,依靠过往的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框架已无法分析这些地区的特征,从而采纳了吸收人类学和民族学成果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从有人把区域研究叫做东洋学和殖民地学的美国版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早期的地域研究内含着一种殖民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式的因素。其实,研究者们基于何种兴趣,又在何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来研究哪个区域,都潜在地受到形成研究者知识结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而既然区域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那么,它就不可能与这些被跨越的学科所固有的思考方式无关,因此也必然与形成这些个别学科的文化、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存在于其根本之处的意识形态基盘发生关联。因此,区域研究必须常常对自身内在的知识结构中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抱以反省的视线,意识到自己的研究不可能是真正中立的研究。而这种视线和意识也必然会延伸到区域研究所涉及的相关个别学科,从而构成促使这些学科进行内部改良的契机。

日本《思想》杂志1997年第7期刊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Harry D. Harootunian与康奈尔大学教授酒井直树的对话《日本研究与文化研究》。该对话以美国日本研究的危机为引

子,论及了区域研究中的构造性问题,对我们中国的日本研究也极具启发性。下面笔者将参照该文指出的美国日本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来思考中国日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Harry D. Harootunian 在论及美国日本研究的危机时首先着眼于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研究与其资金来源之间的关系,认为过分依赖研究对象国和相关基金机构的资金援助,不得不在研究结果上反映这些资金所代表的利益,从而有可能在研究的方向性和应有方式上产生偏差。^[5]

在中国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对包括日本研究在内的各个区域研究的控制权。除了资金这一首要环节外,政府还主要通过下列几个方面来实现对区域研究的主导地位。一是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指导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国别研究所之一,作为政府对日政策的智囊机构,既为国家提供政策咨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政府的意志。该研究所作为中国日本研究的领头羊,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发挥着示范或定向作用。二是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来实现对区域研究的主导权。每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研究的风向标,折射出当前社会最关注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也潜在地左右了研究者的关注重心和研究方法。

而成立于2008年的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代表。据日本共同社2009年4月10日的报道,该研究中心是由佳能、西科姆(SECOM)、野村综合研究所等日本企业及智囊团出资约1.5亿日元(约合1020万元人民币)创建的。尽管该中心的宗旨称,通过跨学科、文理融合的学术研究和注重产学研与社会效益并举的多层面交流,努力把中心建设成具有清华特色的日本研究机构和推动中日交流合作的基地,但网上还是有人质疑用日本人的钱来研究日本,是否能够达成客观独立的研究。^[6]

笔者认为,Harry D. Harootunian 或许是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即如果把学术研究的自律和自主视为一种理想,那么,在进行区域研究时,就有必要保持一种戒备心,警惕区域研究被有意或无意地卷入由特定的权力关系或利益关系所规定的价值观体系中。而一旦被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状况所制约,学术将很难保持自律性。有一点值得我们倍加注意,因为区域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它与政府、媒体和民众之间很容易形成一种“共犯”关系。即它在被由政府、媒体、民意等形成自身知识结构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同时,其研究的成果又很可能会反过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媒体的立场以及民众的想法,从而进一步强化整个社会在知识结构上的意识形态要素。

Harry D. Harootunian 接着指出,地域研究的主导者们,即在精英大学里主持区域研究项目的人们,只关心如何寻找资金来维持此前的研究,因此他们对自己的知识生产结构和学问知识缺乏应有的关注。因为对知识生产结构缺乏认识论上的视点,认为区域研究只需保持传统学科中继承下来的知识结构,从而放弃了作为区域研究显著特色的多领域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进而依据同一理由,只专注于不断产出关于作为区域研究对象之日本的同型知识。而之所以关于区域研究对象的同型知识可以不断被产生出来,显然是有赖于这样一种观念:某种文化应该具有统一的有机整体性,关于某个区域的统一认识必然反映了这个区域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比如,当我们说到日本人的特质是集团主义的时候,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一认识适用于所有的日本人;说到日本社会是一个纵向构造的社会时,也就意味着日本社会的所有层面都是纵向的。而当区域研究跨越各种传统学科的时候,因为也照搬了以

“日本式”来概括的所谓文化的有机统一体这样一种基本的思维模式,常常认为关于日本的认知无非就是各个不同领域的日本认识的单纯叠加,比如直接沿用或叠加包括日本历史、日本社会文化等传统学科的既有认识,忽略了日本文化和社会的复杂性和多重性、非均一性和变动性。这导致了所谓大同小异的“日本人论”和“日本特殊性论”的大肆流行和批量生产,以至于“日本人论”和“日本文化特殊论”等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而关于日本的认知一旦被嵌入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很可能在不经动态的具体分析和论证的情况下轻易地就派生出相同或近似的结论,演变成为一种言语的暴行。比如,只要看看国内关于日本战后文学的部分研究成果,我们就不能不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近年来,以王向远、刘炳范等为代表的学者在讨论日本的战后文学时,提出了一种“反对战败”论,他们认为,日本战后文学所谓的“反战”主题,实质上只是“反对日本的失败”。换言之,如果侵略战争不失败,那就不反对。刘炳范进而论述道:“‘反战’作品是作家以自己的勇气、良知和高尚的艺术道德勇敢地以文学作品为武器,向一切不正义战争进行战斗,而战后日本文学的‘反对战败’作品实际上是支持法西斯发动的那场战争的,反对的只是战争的‘失败’。”^[7]显然,当论者用“反对战败”这一个词语来概括所有战后派作家对战争的认知时,无疑是用一种预设的意识形态来代替了文本研究和具体分析。而这种意识形态在中日关系因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问题陷入僵局的时候,作为印证了日本人扭曲的战争认识的有力材料,被认为“该观点的提出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因此,“以王向远、刘炳范等为代表的可称为新兴的‘反对战败’论,该观点近年来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8]

Harry D. Harootunian 在谈到美国的日本研究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很多大学创建的区域研究都具有一种显在或潜在的军事意图,比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就是在战时情报局的支援下出笼的。当时美国的亚洲研究乃是为实现美国对亚洲的扩张野心而搜集情报,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在美国的日本研究中,日本扮演的纯粹是田野调查中的情报提供者角色,而美国则拥有对情报进行分析和处理的理论装置,掌控着对情报的处置权。显然,这其中存在着一种非对等的殖民主义构造和政治关系。

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的日本研究时,发现情形似乎更加错综复杂。首先,这和中日之间几千年的关系史密切相关。直到甲午战争为止,中国一直是日本的老师,我们习惯了把古代的日本文化看做是中国文化的模仿,把近代的日本文化看做是对欧洲文化的模仿,“小日本”这个称谓就代表了中国人在看待日本和研究日本时的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尽管近代日本走在了我们的前列,但不少中国人还是习惯了过往的定位,继续顽迷地固守着对日本的蔑视。而日本对中国的那场残酷的战争更是从一个相反的方向强化了中国看待日本的政治视角。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还不能不时常贯穿着“被侵略者”看待“侵略者”的视线。不用说,上述两种情形都显示出非常明确的非对称性。而新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在从事日本研究时,往往是把日本作为研究的情报提供者,而我们自身则扮演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装置对来自日本的情报进行处理的角色,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泥淖的主体性。而近年来,当我们进行日本研究时,即便面对同一个作为情报提供者的日本,我们要么是借助欧美的理论装置来进行情报过滤或处置,要么就是直接用日本的理论装置来处理日本的情报。无论属于那种情形,暴露出的都是我们主体性的阙如,而这种主体性的阙如很可能威胁到我们对研究对象的视点,迫使我们只能搬出某种顽迷的意识形态来武装自己,来偏执地主张自己的主体性。而这很可能导致我们不再去反思区域研究中常常伴随的意识形态构

造,而毋宁说主动加入到这种构造中,甚至成为固化这种构造的一环。

Harry D. Harootunian 阐明了区域研究中具有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构造后,认为从认识论的视点出发批判其中的意识形态机制,是至关重要的。但因为这种知识结构的意识形态机制常常被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因此,有必要在区域研究中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文化研究有着强烈的左翼批判色彩,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席卷全球和西方的一种激进的左翼社会运动的产物。文化研究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影像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来研究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若丁·萨达(Ziauddin Sardar)在《文化研究介绍》(*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一书中,列举了以下五个主要的文化研究特色:文化研究意在检视其主题中的文化活动以及文化活动与权力的关系;其目的在于了解文化所有的复杂样貌,以及分析社会与政治脉络中的文化展现;文化研究是研究的客体,同时也是政治批评与政治行动的场域;文化研究试图揭露与调解知识的分歧,试图克服内隐知识与客观知识这两者之间的裂缝;文化研究致力于对现代社会进行道德评价,以及进行激进的政治行动。从上述的特征中可以看出,文化研究者时常关注某个现象是如何与意识形态、种族、社会阶级或性别等议题产生关联的。因此,通过在区域研究中引入文化研究的视角,可以使我们更加有意识地去发现区域研究中知识与权力、知识与意识形态等的复杂关系,从而对包括区域研究在内的现代知识建构以及和政治和权力的关系有一个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反思性批判思维的一条主线,是深刻思考当代中国日本研究的学术建构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权力与知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针对中国的学术政治化、权力化的传统,我们中国学者往往把西方社会科学的独立性、自律性提到一个非历史的高度,用意是以一个“西方主义”的现代性学术神话来打造中国的现代性学术。但正如 Harry D. Harootunian 所指出的美国日本研究中的危机那样,西方的区域研究也从来就不是独立于政治之上的自律的神圣殿堂,也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斗。因此,在中国建构“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时,我们可以把美国的日本研究,还有日本的中国研究等区域研究作为镜子,来反思中国日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而反思性批判思维是区域研究中绝对不可缺位的重要环节。或许可以这样说,尽管我们知道,不可能存在着百分之百中立的研究,但最大限度地接近中立的学术研究,乃是包括区域研究在内的所有学问的理想。因此有必要保持对包括知识构成在内的结构进行反思性思维的态势,发挥由区域研究的跨学科性所带来的超越性视点的作用。而这也是中国的日本研究作为区域研究是否能够成为真正具有学术性的日本学的关键。

当然,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还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即通过对作为对象的日本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以达成对日本固有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不是将这种固有性作为日本的特殊性来加以主张,而是尽可能在与其他区域的相关性上来理解这种固有性。中国的日本研究也理应和美国的日本研究、日本的中国研究等等一样,不是停留在验证日本这一特定区域的个别性上,而是将其作为通往世界普遍性的切入口或映照出世界整体图景的无数镜像中的一个。

【注】

[1] 参见蒋立峰、杨栋梁.中国的日本研究现状与展望[C]//中华日本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国际交流基金编《中国的日本研究 1997—2009》[C].2010(05):4.

[2] 同上第 9 页。

[3] 鲁东理.中国的日本研究水平亟须进一步提高[N].日本新华侨报,2010 年 1 月 28 日.

[4] 徒温.国别研究有别于国别学,拉美研究有别于“拉美学”[J].拉丁美洲研究,2000(2).

- [5] ハリー・ハルトウーニアン, 酒井直樹. 1997(7). 日本研究と文化研究[J]. 思想. 本文中所引 Harry D. Harootunian 的观点, 均出自该对话记录.
- [6] 参见秦全耀《清华大学成立日本中心竟是日本出钱》(新浪读书论坛 2009 年 9 月 25 日) <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d-2859424-1-1.html>.
- [7] 刘炳范. 2003. 战后日本文化与战争认知[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4.
- [8] 何建军. 2007(2). 论日本战后派战争文学的主题[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作者信息:

杨 伟:男 四川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 中日文化对比研究

E-mail:yukio717@163.com

『愚管抄』と『神皇正統記』

—中世日本における二つの天皇観—

法政大学 小秋元段

〔摘 要〕 中世の日本人喜欢夸耀天皇家族皇位继承上的永续性。但慈円在《愚管抄》中却注意到了天皇资质的局限性。他是因为试图将辅佐天皇的摄关家的地位加以正当化而获得这一认识的,可以说在中世的日本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本文尝试着通过与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統記》进行对比来佐证这一点。

〔关键词〕 天皇制 愚管抄 北畠亲房 神皇正統記

1. はじめに

現在、法政大学国際日本学研究所では「〈日本意識〉の変遷—古代から近世へ」と題する共同研究が進められている¹⁾。この共同研究は、歴史の節目節目で日本の人々がこの国をどう意識し、記録してきたかという問題を、文学・史学・思想史等にまたがる側面から追究することをめざすもので、筆者もそのメンバーの一人として、主に中世(12~16世紀)を対象に研究にとりくんでいるところである。

古代から中世にかけて、文献上あらわれる自国意識としては、日本「小国」観があげられる。「日本国小国也」(『愚管抄』卷三、醍醐天皇条)のように、自らを「小国」と見なす記述は枚挙に遑がないほどで、この時期の知識人に共通の感覚であったようだ。その際、「小国」に対する「大国」は中国をさした。また、仏教的世界観に照らしたとき、日本は「粟散辺地」とも称された。世界の果てにある小さな島国との謂である。

だが、その一方で、人々は別の面で他国に対する優越意識をもっていた。それは皇位継承の連続性に対する誇りである。中国では王朝の交替があつたのに対し、日本では神話の記述に従えば、天照大神の子孫が連綿として皇位を継承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例えば、北宋の雍熙元年(984)、渡宋して太宗にまみえた裔然は、神代以来の皇位継承の次第を説き、『王年代記』を献じている。このとき、太宗は島夷にすぎない日本で「古の道」が守られていることを称讃したという(『宋史』日本伝)。また、南宋の熙寧五年(1072)、神宗に拝謁した成尋も、天神七代から第七十一代後三条天皇までの皇位継承の次第を述べ、日本では皇位が神の子孫によって受け継がれていることを説いている(『参天台五台山記』巻四)。このように日本では、皇位の継承が他氏を交えることなく、天皇家のみで行われてきたことが自国の優越する点であると認識されてきた。そして、外交の場では特にこの点が強調されてきたことを、上記の事例は物語っている。

つまり、古代・中世の日本における自国意識とは、「大国」中国に対する「小国」としての劣等意識と、神の子孫が正しく皇位を継承してきたという優越意識によって平衡が保た

れるという構造をとっていた。とりわけ後者の意識は神国思想として蒙古襲来などの危機を通じて喧伝され、やがて近代日本の帝国主義・軍国主義の支柱になっていった点は贅言を要すまい。したがって、歴史の節目節目で人々が皇位継承の連続性をどうとらえ、記述していったのかを振り返ることは、日本における自国意識形成の歴史をたどるとき、重要な基礎作業になると思われる。とりわけ中世には、慈円(1155~1225)の『愚管抄』と、北畠親房(1293~1354)の『神皇正統記』という、二つの重厚な歴史評論書が存在する。この二書にはいうまでもなく、天皇制に関する言説が豊富に含まれており、本稿では彼らの天皇観を対比的にとらえることにより、それぞれの特徴を明らかにしてゆきたい。

まずは両書の概要を記しておく。『愚管抄』は七巻から成り、第一代の神武天皇から当代の順徳天皇の時代にいたるまでの歴史を叙述する。歴史の変化を「道理」と呼ばれる法則に従って説明しようとした点に特徴がある。その成立は、後鳥羽院が鎌倉幕府を打倒しようとして失敗した承久の乱の前年、承久二年(1220)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ただし、現存本は巻二の年代記に、順徳以後の仲恭・後堀河の二代の天皇の事績を追記している。著者慈円は摂関家(摂政・関白を世襲する最高の家柄)の出身で、父は関白藤原忠通。天台座主を生涯に四度務めた高僧である。同腹の兄、兼実にはじまる九条家を支持し、『愚管抄』執筆当時は兼実の孫道家とその子頼経を強力に支援していた。後述するように、この立場は『愚管抄』の主張に大いに反映することとなる。

『神皇正統記』は、天地開闢から当代の後村上天皇の時代にいたるまでの歴史を叙述する。天照大神より「正直」「慈悲」「知恵」の三徳を象徴する「三種神器」を授かった皇孫のうち、後村上天皇にいたる血統が最も正統であることを主張する点に主眼がある。著者の北畠親房は後宇多・後醍醐・後村上の各天皇に仕えた公家で、後醍醐天皇が足利尊氏と対立して吉野に出奔し、南朝を樹立したあとは、その指導者的存在として各地を転戦した。そうしたなかで、『神皇正統記』は延元四年(1339)に一旦成立し、興国四年(1343)に修訂されている。

それでは以下、両書の考察に入ってゆきたい。

2. 『愚管抄』における天皇観

前述したように、日本では王朝の交替がなく、天皇家内で一貫して皇位を継承してきたことが誇りとされてきた。だが、慈円の主張の興味深い点は、その弊害を鋭く突くところにある。

ソレニ国王ニハ国王フルマイヨクセン人ノヨカルベキニ、日本国ノナラヒハ、国王種姓ノ人ナラヌスデヲ国王ニハスマジト、神ノ代ヨリサダメタル国ナリ。ソノ中ニハ又ヲナジクハヨカラヌトネガフハ、又世ノナラヒ也。ソレニカナラズシモワレカラノ手ゴミニメデタクヲハシマス事ノカタケレバ、御ウシロミ用テ大臣ト云臣下ヲナシテ、仰合ツ、世ヲバヲコナヘトサダメツル也。コノ道理ニテ国王モアマリニワロクナラセ給ヌレバ、世ト人トノ果報ニヲサレテ、エタモタセタマハヌナリ。(巻七)^[2]

天皇にはふるまいのよい人物を就かせるのがよいのだが、日本では天皇家以外の人物